

是日美贸易额的3.1倍。在所谓的中美“脱钩”和“新冷战”阴影下，中美经济关系持续超过日美经济关系，对此，日本不可能不知道，跟随美国反华，受损一方明显是日本。日本外交评论家松本重治说，“日美关系的实质是中美关系”，在日美关系中，中国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还有日本学者说，日本政府最近对华态度强硬，试图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实际上损害了日中经贸关系。

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日本外交正处于“十字路口”。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日本的利益认知和战略思考并非完全与美国一致，而是表现出既重视同盟、也追求自主性的特点。日本前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日本虽应与美步调一致，但不等于所有政策都必须苟同。”日本国内有学者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盟国，也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日本有责任实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统合。对日本来说，把中美纳入CPTPP，可以避免中美和中日在经济上彻底“脱钩”，符合日



供图：澎湃影像平台

2020年11月17日，“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在北阿拉伯海举行第二阶段海上军事演习。

本的利益。

在日本社会，确实有不少人乐见中美对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美国才会更加重视日本，日本可以捞取好处。日本一些人一直有利用日美紧密合作向中国施压的思考习惯，但事实一再证明，这只能起到反效果。摆脱过度依赖美国的状态，才是日本面对中国所应做出的正确选择。

日本政府虽然越来越靠近美国，但也留有余地。美国借新疆问题大做文章，压制中国，日本外

务省明确表态，不认为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日本是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当中唯一没有因新疆问题制裁中国的。

总之，日本不可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也有其两面性。中国既不可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期待，也不必推日本成为美国实现其遏制中国战略的助力。中国应关注日美分歧，扩大中日共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日关系向稳定、平衡、理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与东盟要能共同自主决定地区议程

郭延军（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

政府的对华政策改变了“零和博弈”基本策略，虽然采取的是全面竞争战略，但合作也在慢

慢恢复。

“新常态”能够更准确、全面地概括中美关系当前的发展

态势，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相持阶段，并可能呈现出三种具体形态：一是全面竞争。从美国出台的一些报告不难看出，美已发起所谓“全路径”（全政府、全社会、全文明、全方位、全世界）对华打压。二是选择性合作。过去中美合作领域覆盖面宽，相关逻辑主要是基于绝对收益考虑。现在无论是对合作领域的选择，还是对合作收益的考虑，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多表现为基于责任和成本分担的选择性合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合作逻辑则更关注相对收益。三是有限对抗。尽管美对华政策工具丰富，但对涉及主权等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仍算谨慎。

美对华战略折射到中国周边地区，将对地缘政治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第三方力量的选择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博弈的结果。中美博弈使得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美国的盟友体系。个别国家如澳大利亚已经选边站，更多国家处在矛盾和焦虑中，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对于这些国家，中国不必抱太高期望，应尽量以经济和市场手段维护正常合作。另一个是东盟，相关国家成为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但东盟明确表示不会选边站。虽然东盟已接受“印太”概念，但并未放

弃平衡外交，正努力淡化“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色彩。《东盟的印太展望》文件被东盟明确定义为“参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事务”的指导性文件，反映出东盟力避亚太合作全面“印太化”的考量。

新加坡前高级外交官、著名学者马凯硕认为，东盟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东盟作为“中间地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应以综合手段充分争取。

第一，与东盟共促多极化。国际上有一些人担心中美形成所谓两极对抗格局，但我们认为，多极化仍有强大生命力，未来可能会形成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积极主动地推动多极化进程，塑造地区秩序，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创造更大空间。过去东盟通过为大国提供合作平台，把制度性权力发挥到极致，为缓冲大国竞争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努力将其塑造成一个地区制度性权力的中心，牵制美对华战略围堵。

第二，深耕地区治理。一般而言，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治理有两种主要模式：地区一体化治理模式和议题治理模式。两种模式互有区别，又互有交叉，相互促进。在众多东亚一体化合作架构中，都规定了优先合作领域和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这种议题治

理模式中，也逐步加入了地区一体化的考虑。无论哪种模式，一个明显趋势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地区治理的成效更为显著，而且地区国家对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和追求可以让各国更为理性和冷静地处理分歧。因此，一种“去美国化”的地区治理模式应得到更多重视。经济上，坚持以互利合作为抓手，巩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压舱石”效应。安全上，从地区危机管理的视角去讨论安全热点问题，形成真正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认同。

第三，坚持“过程导向”，维护亚太合作框架。“过程导向”是东亚合作的成功经验之一，渐进性、灵活性、协商一致以及照顾舒适度等原则在维护地区合作进程、缓解大国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回望双方合作历程，不难发现过程之于结果的重要性。当前，美对华战略强调“结果导向”，根本目的是阻断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印太战略”作为美遏华重要工具，对坚持“过程导向”的亚太合作框架造成冲击，亚太框架面临“印太化”危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与东盟应进行更为密切的沟通和协调，维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既有成果，共同自主决定地区议程，避免亚太合作走向“印太化”。